

温州文献丛书

王理孚集

王理孚撰
张禹 陈盛奖编注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

王理孚撰
张禹 陈盛奖编注

王理孚集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理孚集/王理孚撰;张禹陈盛奖编注. —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80681-907-X

I. 王...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文学-作
品集-中国-现代②王理孚(1876~1950)-文集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9551 号

王理孚集

作 者: 王理孚

编 注: 张 禹 陈盛奖

特约编辑: 宗 人

责任编辑: 余 同

封面设计: 姜 明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

插 页: 6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ISBN 7-80681-907-X/K · 241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 任：钱兴中
副 主 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 员：马允伦 卢礼阳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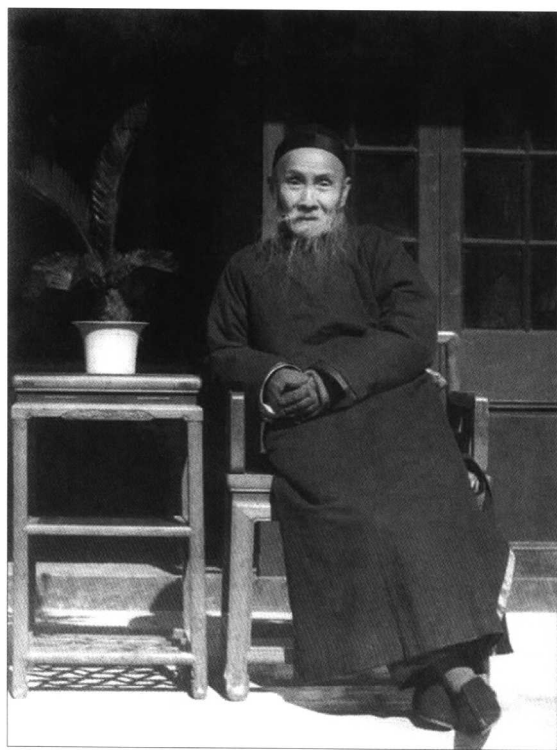
副 主 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 编：胡珠生
副 主 编：陈增杰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如元 张乘健 陈明猷 周 干
周梦江 金柏东 萧耘春 潘猛补



王理孚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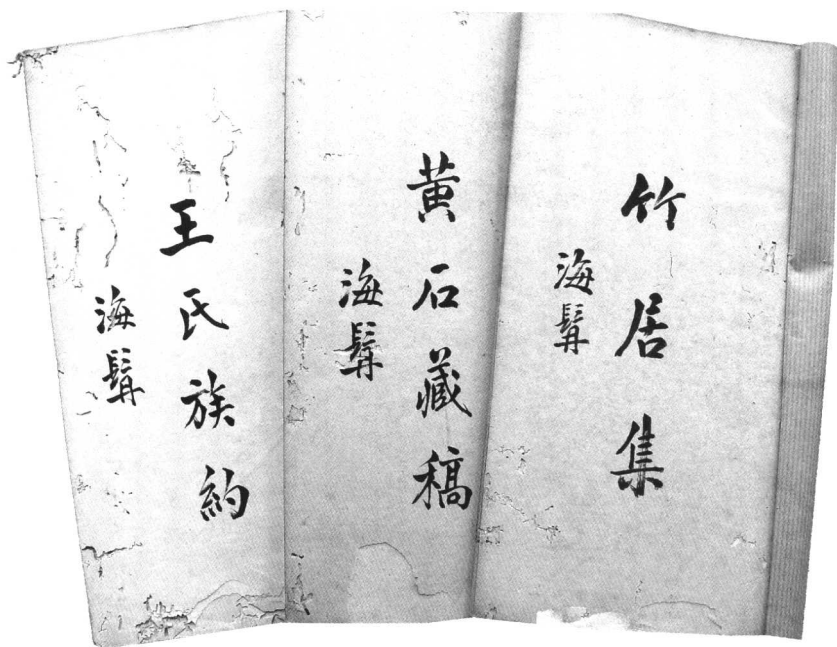


王来燕 供稿



《海髯诗》《王海髯先生年谱》复制本书影

陈盛奖 摄



《竹居集》《黄石藏稿》《王氏族约》书影

陈盛奖 摄

職務姓名

發起人

姜會明

黃光

王鼎銘

游鳴鑾

馬廷駒

張翽

宋存法

尤于岸

宋作霖

兼採訪

陳黃明

項廷騏

葉志庚

王適

范任

楊慕份

陳錫琛

陳鳳飛

吳拱宸

徐煥之

兼採訪

陳彝訓

陳振洛

黃華三

施建中

陳承紱

黃守謙

蕭敬敷

周宏毅

陳鴻璣

林樹棠

鄭贊謨

范平

兼採訪

蔡巽

鄭愷

主任

王理孚

總纂

鰲江公學禮堂紀念

斯堂所事非他為吾黨
謀改良性質

莫誤用聰明

近水之民多智願諸君

王理孚并書

王理孚主持平陽鰲江公學時期為禮堂題書的聯語

盧禮陽 供稿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温州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永嘉四灵诗集》《林景熙集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夏承焘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一九九二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一九九六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一九九八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

籍丛书》的倡议,限于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设备受关注。二〇〇一年,钱兴中市长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专人,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一九四九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标

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二年七月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1. 收集原书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辨其源流,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最精者为工作底本。整理时用其余各版本通校、并于“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参校要籍的名称、版讯(包括本书援用时的简称)等。

2. 尽量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见,并尽可能对原书的引文进行复核,校注中的举证和引书均应准确无误。

3. 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则正文改从他本,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举一二有代表性者为例)。

4. 正文或原注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5. 校改符号用法如下:

(1) 脱:在()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 衍:将衍字写在< >内。

(3) 讹:在讹字后面用[]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 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6. 原书所用异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他本已用通用字者,不再出校。

7. 原书所用避讳字,如“弘治”作“宏治”、“陶弘景”作“陶宏景”等,据古本及原书改回,但必须有确据。首见处出校或加注

说明,其余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8. 原书行文中涉及国家、朝廷、上司、宗族等所用的“抬头格”均予删除。

9. 凡一篇数首,一首一段,两首之间不空行,不标各首序次。

10. 校注文字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文序号均用“①②③……”列于正文右上角,句末可列于标点符号之外。

11. 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原注均予保留。新增注释以乡土人物、事件等为主;凡涉及名物训诂与音读的内容,除非普通辞书、字典未收入,或虽已收入而存在误释,一般不注。

12. 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鉴等可省略撰(著)者。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时均按时(朝)代、撰(编)者、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多次引用只注撰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卷次用汉字(双位数以上,如卷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余类推)。古籍线装本页码亦用汉字。

13. 各书附录及资料汇编类选题,如已有单独出版者,重复内容不再编入,将有关情况在前言或后记中加以说明。

14. 凡因选题存在特殊性(如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版本校勘的问题),本凡例所列条款难以适用者,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前言

王理孚，字志澄（亦写作“澈”），又名锐，字剑丞；开发南麂岛时自称“海上虬髯”，因以海髯为号。1876年（清德宗光绪二年）生于平阳县江南区陈营里地方（今属苍南县），1950年病歿于永嘉县城（今温州市鹿城区），终年七十五岁。新修《平阳县志》（1993年版）第三十七卷《人物》有传。本书附录王来棣等审校的《王理孚先生年谱》和王栻文章《我所知道的父亲》两篇，对王氏的家世、履历、学术、事功和思想作了比较具体详备而且全面客观的介绍。两人均为王氏直系亲属，且都是专攻中国近代史的资深学者，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和论断，具有高度的可靠性。本文试从更宽广的时空来观察和剖析王理孚和他的《海髯诗》所产生成长的过程、所达到和没能达到的境界，以及它们背后的某些因由。这也许可以让远去的历史为今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或多或少的借镜。

王理孚幼时家贫，无力延师，从九岁起寄居张家堡（今苍南县龙港镇郊）杨家附读。十一岁时，邻村秀才刘绍宽应邀到张家堡杨家授徒，王理孚偕杨慕俦两人成了刘氏第一批门生。从此，刘、王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了五十余年。这一际遇对王氏的成长至关重要。

清代的平阳（包括今苍南全境）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偏僻县份，据统计，自顺治四年（1647）到道光十九年（1839）近二百年间，仅一人中进士，五人考中举人（转引自胡殊生《温州近代史》第十九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列强入侵后，清帝国内运衰

败,科举教育自更无振兴之望。当刘绍宽、王理孚师生在张家堡杨家私塾开始携手踏上人生之路时,这一条传统的读书仕进之路几乎已无任何前途可言了。好在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渐渐觉醒过来,在十九世纪末形成了变革维新的风气,邻县瑞安的一批中青年读书人受孙、黄两家高层人物的影响和支持,成立了讲维新求变革的地区组织——“求志社”,纷纷著书立说,并在社会推动各种改革实验。尽管当时的许多新人物、新思想不免夹带着种种的幼稚、浅薄、偏颇甚至谬误,但对于身处困境的读书人来说,确实起了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作用。平阳万全区人宋平子(名恕,晚年改名衡)从年轻时移居瑞安,融入求志社活动,九十年代后活跃于京、津、沪等地,成了名倾一时的维新派理论家,与章太炎并称“浙江两奇才”。宋平子的崛起,是对几百年来笼罩着平阳的封闭落后状态的第一次有力冲击。

光绪四年(1888),即刘绍宽在张家堡杨家开始授徒的第三年,瑞安求志社员金晦(原名鸣昌,字志曾,号稚莲,后号遁斋)也应邀到了张家堡,在另一家讲授经学。金氏追随孙锵鸣之后,极力倡导清初学者颜元(习斋)、李塨(恕谷)一派之学说,来平阳后立即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士子,包括刘绍宽在内,均从金氏学;次年转到金乡狮山书院,从学者仍追随不舍,形成了江南区一次短暂的学习颜李学派的高潮。金氏认为清代学术以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三大宗,而颜氏最为“醇正”,继而经李塨之补充修正推广,遂成颜李学派,是最切实有用的“直接数千年君师学校之传”的一门学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颜李一派为“实践实用主义”,是对两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它讲求实学实用,反对一切空谈玄谈;强调人的主动实践,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兵农、器物等社会实践。所以,梁启超肯定它虽然打着复古的旗号,其精神却是“现代的”,即与维新改良相一致的。刘绍宽说,他师从金晦后“始识求

学门径”，并把以前所学的经学、考据、训诂、地理等统归之于“俗学”，要加以扫除。《厚庄日记》多次记述聆听金氏海导和阅读颜李著述后的心得和反思，其内容涉及立身、治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尤以自身在施教中所见所感为重点。直到二十世纪之初，刘氏已在平阳以至全温州地区确立了他在教育界的很高地位，而金氏则完全退隐于平阳城内一家酱园的杂务劳作之后，刘氏仍经常往谒以前的老师，并与之作深入交谈。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后两次修纂的《平阳县志》，都推崇金晦来平阳开导了学风转变。正是在这转变过程中，刘绍宽从一个普通乡村私塾教员逐渐成长为浙南地区近代教育大家；在他门下，也造就了一批转型的知识者，其中包括许多平阳籍的杰出人才。其影响之深远又大大超出宋平子。

从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看来，虽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王理孚因年少而未曾直接领受金晦的教导，后来也不曾对颜李学说做过认真研究，但经由其老师刘绍宽的言传身教，他不仅接受了梁启超所肯定的“实践实用主义”精神和思维方式，并把它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刘王师生间的终身情谊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石上，随平阳的学风转变过程而有新的进展。由于资料的缺乏，今人已难具知百余年前刘王师生间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但从《厚庄日记》约略可见，刘氏师从金晦后渐渐认识到“时文”之弊害甚大，使人越学越无知无能，亟思废之不教，也思考过如何保障学童身心健康成长的问题。这都有异于当时一般私塾教师的传统理念和旧惯做法，让从学者少受些摧残和扭曲。王理孚出生于落后农村的贫苦家庭，因此，在他身上有一种自然地倾向于颜李学说反传统文化的冲动。也许刘绍宽正是敏感地察觉到这一点，才认定这个最得意门生吧。也正是依靠良师的庇护、海导和荐引，王理孚这个县生员才学有所成，逐渐走出平阳，成了省议会常驻议员、省都督府秘书，最后当了一任县长，走到了仕途的高处。

王理孚曾自谓“少年轻躁”。这“轻躁”从另一面来说就是勇于实践,敢闯敢干。他在宣统元年(1909)三十四岁时当选省谘议局议员后,虽然资望较低,却敢说敢为,深得同人赏识;在提学使司科长和都督府秘书任上,也以干练而获好评。他从刘绍宽那里学到的主要是一些文史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有关当时政治形势的部分常识,加上在本地办学的点滴经验,单凭这么一点点本钱是不足应对新局面新要求的,但他以开拓进取的积极态度,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不断超越自我,终于完成了一生事业上的重大飞跃。这种业绩,在他那一辈县学生员中显得很突出,更非为数众多的潦倒终生的“孔乙己”型腐儒所敢比拟。民国元年(1912),他筹资两万银元亲往南麂岛开垦,更是一件十分大胆的创举。温州诗人刘景晨在1949年为《海髯诗》作序时,特别推重王氏此一举措,谓其“能建非常之事功”,“足为诗人张目矣”。他自此以“海髯”为号,说明他自己也很看重这一举措。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种事功同宋代永嘉学派注重事功的思想有较深渊源,也与清初颜李学说的实践观相契合。因此也可以说是金晦、刘绍宽等人共同开创平阳新学风以来所取得重大积极成果之一。

但是必须指出,产生于几百年前的颜李学说所强调的实践、实用、实学,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不是颜、李两人的过错。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离梁启超所说的“现代性”太远了,在那里不论怎么实践,也绝不可能凭空建起一套具有近代民主和科学特征的、比较完整圆通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他们的实用主义虽有朴素唯物论倾向,也不乏辩证法因素,但就总体而言,则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因此,这种学说有时确实对某种对象有极大破坏力,但有时却又极易于随机而变,甚至妥协投降,总之是服从于特定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立场、利害关系、认知水平,而缺乏“抽象”的原则性。在孙锵鸣和金晦,以及同时代人梁启超眼中,颜李学说是为晚清的维新变法主张开辟道路的,那